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 乡土文化转型

李友梅 等著

·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 乡土文化转型

李友梅 耿敬 刘玉照 王光东 等著

·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李友梅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7170-4

I. 快... II. 李... III. 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7529 号

责任编辑 郭立群 毕 胜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

李友梅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69,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170-4/G·1155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乡土文化转型的四个路径	2
第二节 本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8

第一部分 乡土文化转型的理论分析

第一章 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型	17
第一节 对文化研究的反思	17
第二节 转型期与文化的快速转型	26
第二章 乡土文化的特征	37
第一节 传统社会乡土文化的特征	37
第二节 快速转型期的乡土文化	49

第二部分 乡土文化转型的经验分析(一):征地农民

第三章 大开发前沿的农民问题:内涵与成因	109
第一节 大开发前沿的征地农民问题	109
第二节 新旧体制碰撞:新的行动空间的出现	116
第四章 征地农民的社会融合	153
第一节 再结构化:推动征地农民融入主流结构	153
第二节 “退路”何在:对征地农民“退路”的 一点思考	204

第三部分 乡土文化转型的经验分析(二):都市外来人口

第五章 当代中国城市婚姻移民的融入困境

——以上海市芷江西路街道外来媳妇为例 219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219

第二节 外来媳妇的融入困境 223

第三节 经济融合滞后的社会网络分析 233

第四节 小结 241

第六章 城市中“民工”的生存及文化境遇

——以尤凤伟长篇小说《泥鳅》为例 242

第一节 《泥鳅》回应了怎样的一个社会问题 242

第二节 城乡对立

——弱势群体在强势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247

第三节 乡土文化中伦理底线的突破

——“地下性产业”崛起 263

第四节 城乡对立的激化状态 273

第五节 城市病的繁衍与加剧 282

第四部分 乡土文化转型的比较分析

第七章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民 291

第一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与农村:

一个文献综述 291

第二节 乡土文化的复兴 301

第三节 “移民化”及“反移民化”

——从“都市新移民”角度进行分析 313

参考文献 321

后 记 343

导 言

改革开放 20 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改变了中国社会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面貌,以农民为载体的乡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以及伴随而生的现代价值观念,正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的乡土文化。

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大约经历了近 200 年的时间,从乡土文化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这样,整个文化所受到的冲击和震荡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感受最为深刻的一次,整个近代社会科学的出现可以说就是对这次“大转变”的直接反应。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说是西方 200 年工业革命史和城市化史的高度浓缩,不但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与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而且工业革命、消费革命和信息化同步进行,并且还肩负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的乡土文化转型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本课题对乡土文化的界定,主要是指可以被社会行动者中的乡村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共同习得的思想、观念、规范和习俗的总称;是由乡村农民顺应社会背景和具体的生活处境建构出的行为原则和关系模式。它可以体现为信仰、价值观念、社区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公众制度、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文化环境和特定象征等大文化的特征。但乡土文化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概念,还是一种作为行动实践的文化,是人们对生活的主观理解,是一个应予以诠释、理解和礼赞的象征体系,是乡村农民这一特定人群的独特产物,是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和转型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不仅与社会背景相关,也与乡村农民具体的生活处境,及其对这一处境的具体理解密切相关。因此,信仰、价值观念等大文化,都可分解到各种很具体的变体形式中去,并分别体现为各自不同的特点。所以,针对乡土文化的研究,既要将其看作一种自变量,又要将其视作一种因变量。在以作为自变量的“文化”为聚焦点的研究中,还必须注意那些导致文化概念产生变异的诸因素,尤其是“社会”这一要素。同时,还要正视作为行动实践的文化和作为客观思想的文化之间相互依赖的自主性关系。这样一种“乡土文化”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当中,已经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其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遭遇的方式和路径不同,其变化形态和内涵、过程和机制也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节 乡土文化转型的四个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从过程上来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四个路径”: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一亿多中国农民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二是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开始的农民工进城,又有一亿多农民不但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离土又离乡”,直接承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第三个阶段是 90 年代中期开始,并在 21 世纪初进入高潮的

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它使得几千万农民在“不得不”接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身份的转型,在户籍制度上变成了“城镇人口”;当然,与这三个阶段同步进行的第四个乡土文化转型的路径是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它使得那些既没有离土也没有离乡的“农民”,同时也没有办法得到“城镇户口”的农民,也在不断地实现着“乡土文化的转型”。下面我们将首先分别对这四个路径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乡镇企业的崛起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当中,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80 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在苏南一些地方开始发展。1984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并规定乡镇企业应是乡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同时肯定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报告转发以后,乡镇企业出现第一次起飞,迅速蔓延到沿海各个省份以及广大内陆地区,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形成了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带、温州、苏南、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至 1988 年,全国已有 1 888.16 万个乡镇企业,与 1984 年相比,增加了 13 倍。其中属于第三产业的企业数占 52.75%,第三产业总产值达 1 052.19 亿元,在整个乡镇企业总产值中占 14.99%。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达 4 992.9 亿元,是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递增率的 2.65 倍。1989~1991 年,受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至

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11 621.69亿元,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6.6%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上缴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5.2%。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量的51.6%,税收增长量的68.2%,国家经营的外贸出口增长量的61.7%,以及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量的61.7%,都来自乡镇企业。(《人民日报》1993年9月19日)

1992年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乡镇企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03年,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预报统计,2003年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 600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工业增加值25 960亿元,同比增长14%;营业收入146 000亿元,同比增长12.6%;出口交货值13 870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利润8 550亿元,同比增长13.2%;上交税金3 230亿元,同比增长20%;支付劳动者报酬9 000亿元,同比增长5.5%。(农业部,2004)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进行的“乡村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的面貌,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1949年,全国有建制镇2 500多个,经过36年的发展,到1985年也只有建制镇2 851个,加上未设建制的县城377个,共有3 228个。而到1992年,建制镇达到了14 182个,短短7年之内增长了将近5倍;如果加上30 000多个非建制镇,小城镇总数达到44 000多个。1999年,建制镇总数达到19 000多个,小城镇总数接近60 000个。(秦尊文,2001,转引自严正,2004)基本实现了我国在80年代初期确立的“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的要求。

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带来了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用了40年的时间,解决了1亿人口的就业问题相比,到1992年,乡镇企业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吸纳了1亿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1992年之后,随着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迅速下降,从每年新增1 000万人,下降到200万人。截至2003年末,乡镇企

业从业人员达 13 500 万人,比上年增加 212 万人,增长 1.6%。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超过 28%。另外,乡镇企业还累计吸收 400 多万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做出了贡献。(农业部,2004)

小城镇的发展与农民职业身份的改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如果说,在第一代乡镇企业工人身上,还有那些仍然在农业与乡镇企业之间不断摆动的兼业户身上,还可以找到中国传统农民的影子,那么在新生代的乡镇企业工人身上,这种影子已经面目全非了。可以这么说,对于这些新生代的乡镇企业工人来讲,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务农的经历,让他们再回到传统的农业中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民工潮”与农民工群体的形成

进入 90 年代之后,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大中城市与沿海三资企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1989 年春节,自初五开始,每天有 10 万农民进入广州,平均每天有 3 万人滞留在车站一带,已经令广州市不堪重负。但是到了 2001 年,仅仅春节 4 天时间,就有 500 万农民涌入广东珠三角地区。(徐勇、徐增阳,2003)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全乡 40 000 人口,18 000 名劳力中,外出打工的就有 25 000 人,劳力 15 000 人。(李昌平,2000,转引自黄广明、李思德,2000)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 年 11 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 9 800 万人。

在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当中,除了一小部分“回流”以外,绝大部分都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长期滞留在城市当中,实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根据白南生、宋洪远等人 1999 年对安徽、四川两省 62 县,5 484 户,22 402 人,14 561

个劳动力的抽样调查,两省外出和曾经外出的劳动力超过农村劳动力的 1/5(22.0%)。其中,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5.7%,占外出或曾经外出劳动力的 71.55%。回流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6.3%,占外出或曾经外出劳动力的 28.5%,占仍外出劳动力的 39.9%。从未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七成(70.1%)。(白南生、宋洪远等,2002)对那些长期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为什么仅仅是实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呢?因为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面,城市化的标志是城镇户籍身份的获得,所以,对于这 9 800 万人口来讲,虽然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并且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尽管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但是他们的生活已经与传统的农民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他们不仅仅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而且生活与居住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乡土文化的变迁,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化转型的第二条路径。

三、大规模征地拆迁与失地农民群体

到 90 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征地拆迁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城镇规模的扩大之外,主要的原因来自各种“开发区”的建设。中国的开发区建设从 1979 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建经济特区开始,到 90 年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开发区热”。到目前,按照喻萍和顾涛的统计,全国有各类开发区 3 837 家,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 232 家,省级批准的 1 019 家。在国家级的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 54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3 个,保税区 15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14 个,出口加工区 38 个(多数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旅游度假区 11 个。(喻萍、顾涛,2004)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园区)6 015 个,已审批的规划土地面积为 35 400 平方公里。总面积超过了海南省,比迄今为止

全国全部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还要大9%。(陈锡文,2004)

据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是3500万人左右,其中,属于失地又失业的大约占一半。(陈锡文,2004)这些失地农民虽然大部分获得了过去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城镇居民”的身份,但是这一身份的价值与过去相比已经大大缩水。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陷入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境地。截至2003年8月31日,国家信访局当年已收到关于拆迁的上访信11641件。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2002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2002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商界》,2003年11月10日)

几千万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是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乡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得到的仅仅是一张已经贬值的“城市贫民”的身份。如果说乡镇企业工人与进城农民工在“结构性无奈”的前提下还有一丝自主的选择的话,那么对于征地拆迁的农民来讲,他们的城市化过程则完全是被逼无奈,那么,这种强制性的身份转化背后,到底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虽然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几千万农民的命运转换已经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化转型的第三条路径。

四、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影响

除了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已经转变了职业、地点和身份的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以外,继续保留在农村和土地上的农民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他们是否还保留着乡土文化的本色呢?其实,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影响使得他们也已经难以避免乡土文化转型的命运,这还不算通过与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的人际互动所产生的“涓滴效应”。

孙立平先生在关于社会“断裂”的研究中,曾经注意到这样

一个现象：“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属于他们的时代。”（孙立平，2003）进入 90 年代，当电视在中国农村地区基本普及以后，这个现象就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试想一下，一个传统的农民，如果常年生活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包围之中，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传统乡土文化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

实际上，孙立平所描述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大众传媒领域，而且在我们整个的现代教育体系当中，又何尝不是这种问题的典型。可以这么说，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都是按照“现代城市文明”的模式来设计的，当伴随着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整个农民的社会化过程已经被纳入了“现代城市文明”当中。记得进行民族研究的有关专家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青年人在中学毕业回到家乡之后，面临着找不到对象的困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在主流文化占主导的学校中读书，已经失去了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的通过“对山歌”来谈恋爱的能力。实际上，同样的逻辑正演化在整个的农村地区。

第二节 本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在乡土文化转型的四个路径当中，本课题重点关注发生在城市内部的“转型”，也就是说主要研究“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两个群体，本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乡土文化转型的理论分析，对文化研究和社会转型进行了反思，对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进行了理论上分析；其次是乡土文化的转型的经验研究，分别结合浦东开发中的农民问题、闸北区外来媳妇的

社会融合、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对征地农民、进城农民工两个群体进行了经验研究和分析；最后是理论上的总结和比较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乡土文化转型的理论分析

“乡土文化”在这样一个不断发生着变动的环境中，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社会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马歇尔·伯曼，2003）而现代生活也是过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各种新的经验与历险的可能，并努力试图去把握这种可能性。然而，人们却始终“不可能在抓住并且拥抱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的同时不厌恶不反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现实”。当那些生活在贫困的乡土社区的人们意识到有一种可以摆脱这种贫困的新生活以及寻找这种生活的风险存在时，他们便尝试着去抓住和拥抱这种新生活，在他们极力摆脱着先辈传统的乡土理念和行为方式以求更大的风险收益时，他们却又发现自己与这种看似美好的新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隔阂或排异性，这时在其身上所体现着的乡土文化传统一方面既是其规避风险、寻求退路的保障，另一方面又成为其融入新生活的最大障碍。这也使其处在一种对乡土文化不能放弃又放弃不掉的尴尬境地。这也就成为乡土文化在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而“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这种乡土文化的现代嘲弄也渗浸到了众多外出务工者这些当代乡土文化的承载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一切活动，一方面可能充满着美好和快乐，另一方面也具有无限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虽然，人们可以面对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与挫折，而且为“维持这样的生活也许需要拼死的英勇斗争，可有时候我们仍然失败了”。乡土文化在这样一种现代社会中也就充满矛

盾与悖论地存在着。

社会体制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关系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这一过程的行动主体合力塑造、生产的,是符合行动主体理性的。作为参与体制变迁的主体又是乡土文化主体,农民是在衡量了复杂的体制环境中所提供的信息后做出理性选择的。但在他们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中,也包含了对新体制变动不居的无奈。一方面,他们依然习惯于农业生活的逻辑里,不仅遵循着经济理性的原则,而且还遵循着许多乡土社会的“惯习”,其行动逻辑仍试图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运用。但另一方面,在时空分离的现代社会中,多数人都处于流变之中,农民工也同样呈现出某种流动性特征的倾向。那些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虽然期待着在城市里能获得一种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虽然在其经济活动中也从某种“长期的”心态出发建构着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但针对他们自身的现实生活而言,他们仍然充满着一种“短期的”心态,并在无奈中(或者已经适应了)取代了原来那种“长期的”心态。他们在新型的“共同体”中,彼此之间也许并不熟悉,没有共同的过去,也不一定会共同建构将来。以往他们所习惯、熟悉的规范、原则和文化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只关注自身眼前切实的利益,而无法顾及其他,一股强大的个体化的力量在不断地使分隔或分裂来代替团结或统一。

二、乡土文化转型的经验研究

在本书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 大开发前沿的征地农民问题

城市近郊农村的快速城市化,直接使近郊农村整体性的转化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城市化的变化过程中,农业人口是被动的被吸纳为城市居民,他们有可能是在没有改变自身生

活方式的期待的背景下,去面对一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生活方式。以上海浦东为例的深入分析,就揭示了由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文化困境。90年代的浦东农村成为工业化早期社会突遇高科技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前线,不可避免地与浦东农村原有的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发展经验和文化价值体系发生剧烈碰撞,它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再结构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组织化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尽管浦东新区采取了许多措施,征地农民还是在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分工和观念意识的城市化等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他们与乡镇企业(成为某个新的产业链的一环,获得市场资源)一样,“进”不能在新体制中获得新的社会位置和有利地位,“退”不再有旧体制的行动空间。它反映了浦东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中难以弥合的断裂,也反映了习惯于旧的农村经济社会体制的浦东征地农民,既在经济大开发中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的伦理、组织方式和基层政治的庇护,又未能成功地被整合进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中。“乡土文化”在此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二)“农民工”与乡土文化转型

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的出现,使得乡土文化同样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依据王毅杰、王微《国内流动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一文的观点,自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农民有了土地耕作经营的相对自主权以及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城市里的户口、粮油配给、公费医疗、就业管制等制度相继软化,各种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兼之城市建设和社会服务需求的增长,形成了农民自由流动的空间。农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84年以前,农民非农化的主要途径是进入乡镇企业,即“离土不离乡”,而1984年以后,农民开始离开本乡,到外地农村或者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特征是“离土又离乡”。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流动农民进入城市后,对中国旧有社会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它引发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

重要社会问题。但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一问题应该注意流动农民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为已由于乡土文化观念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及其在冲突中的自我调整和转型。对于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们以尤风伟的长篇小说《泥鳅》为例,进行了分析。《泥鳅》是一部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流入城市的“民工”在城市的遭遇以及灵魂的挣扎和痛苦。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现代社会以来,每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步伐,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进步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过程意味着社会的分化和裂变,许多天然的、稳固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认定等现实系统被打乱了,往往形成社会秩序的重新组合,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的危机和转型,通过《泥鳅》这一作品中“流动农民”的社会学分析,所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农民地位在哪里?乡土文化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他们自身能否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平衡?理解这些问题就是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并期望发现其中所包含的良性因素,以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 婚姻移民的社会融合——外来媳研究

在城市的外来人口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外来媳。她们携带着浓浓的乡土文化直接进入到城市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在她们身上所体现的乡土文化转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本书的第五章将通过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688名外来媳妇的调查研究,来探讨外来媳群体的文化转型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发现,外来媳妇群体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明显带有经济融合滞后于社会融合的现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现象与她们婚姻前后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变动有关,在她们从打工妹转变为外来媳的过程中,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原有的帮助她们进入城市、寻求工作的初始社会关